

武将

一位喋血沙场的将军在生命将尽之时

一位美少女的女军医

他们不知晓、一个相遇

于是，在那个年代的医院里

《战火硝烟》

《战火硝烟》

《战火硝烟》

区司令员和一位功臣的邂逅，却是一场漫长的相恋，恨手恨足

为争一口气，一个人，一个医院里展开了残酷和较量

一个天生胆狭而又才华惊人的河兵，原来本忠贞，却做他的盲传，以本博得了爱

焦景周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将/焦景周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 12
ISBN 978-7-215-06675-5

I. 武… II. 焦…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9960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233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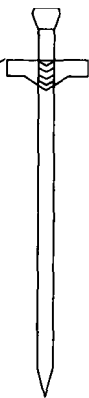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7.625

字数 202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小说之恋

代序

焦景周

1

2003年4月1日,已故著名作家李準先生的铜像揭幕仪式在洛阳大学举行。北京和河南文学界被请去的人并不多,但都是重量级的。我也有幸被邀。在这里我不仅见证了那庄严神圣的揭幕一刻,聆听了诸位大家文采飞扬的演说,而且在李準先生生平研讨会上赵金昭校长也把我特聘为他们学校的教授。我心里明白极了,本人是沾了孟津人的光,有运气和李準生在了一个县。还有,金昭先生与我是朋友,抬举我,给了我一次参加活动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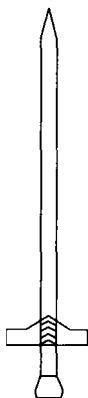
重要的是我又一次经受了文学的浸染,引发了创作欲望,思想着是不是重操旧业,开始写点小说?因为我已经离小说远去了。自1995年在《莽原》发表最后一部中篇小说《苍日》算起,已有8年不曾动笔,连一篇小小说也不曾写过。在军艺上学时刘毅然老师把小说比做是作家的“情人”,说作家不写小说了就等于告别了他的“情人”。那么,我的“情人”很早便被我抛弃了。这一别就是一场“抗日战争”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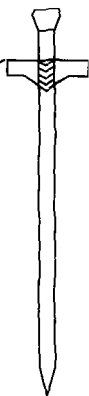
有时候想一想,人生有些事情有些行为真是有点悖论,有点魔症,让你自己不知其故,活得很不明白。

还是从写作说起吧。

本来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那阵子,我还是连发了一批小说的,而且都发在北京和省级以上的大刊上,也取得了一定的反响,有的被《中

篇小说选刊》转载,有的被《小说月报》推介,特别是在《十月》上刊发的《木头沟》,竟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看好,收入了当年中篇年选,排得还比较靠前。这在当时还是十分不易的。即使现在,能上“年选”的作家也是极少数。在军艺文学系第3期学员优秀作品列卷时,《野牡丹》在数百篇小说中脱颖而出,还有几个短篇在好几家文学刊物上都上过头条。那些日子,我的小说也可以说四处开花,每发必中,真是撞了运气。学院也给我“三好学员”的荣誉,接着又被推入“90军旅作家方阵”,一个陌生而又咬嘴的名字忽然间就让人看见了,还不时收到来自天南地北的读者来信,很有点激动人心的样子,有点当了秀才的感觉。中篇小说《五男二女》也是在这个时期写出来的。记得那是1991年春天,我们在军艺的最后一个学期,这个学期是实习,那时海南、深圳刚刚火起来,同学们有很多都结伴去了那里,即使没有“南巡”的,也纷纷去了其他一些地方。而我当时却回到了孟津县。我的好朋友、好老弟、时任中共孟津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的王忠道给我在黄河边找了一个兵营,在那里,我圈了将近一个月,便“生”出了《五男二女》。也是发在《莽原》上,上的还是《名家近作》栏目。3年后这篇小说被改成电视剧,由中篇改成长篇,一共18集。1995年投拍,后来相继在中央电视台和全国多家电视台播出。我的作品真正在社会上特别是在老百姓中造成一定影响的,就是这部反映农村生活的连续剧。那时我才感受到了现代化媒体传播手段的厉害。据我所知,全国有两个城市收视率最高。第一个是上海。统计数据表明,《五男二女》创沪1996年电视节目文艺类收视率排行榜第1名,并有3位演员被邀到上海,在晚上和观众见了面。我的上海籍战友和在上海工作的河南籍朋友经常向我通报信息,表达着他们的欣喜心情。第二个城市便是洛阳。当年的收视盛况不言而喻,听说市台前后播了好几遍,各县电视台也播了。洛阳人看《五男二女》和外地人的感觉又不一样,好像那就是他们村里、家里发生的故事,感情上更亲近一些。特别是他们喜欢对号,我听到的就对上了五六家,包括郑州、孟州和孟津。尽管我一再声明文艺作品纯属虚构





不可以随便对号入座,但还是众口难调,以假为真,实在是叫你无奈。但反过来又说明人家喜欢这个戏,熟悉这部电视剧的生活内容。凡是喜欢看的我都非常感谢,就立马把他们当成知音。由此我在洛阳结识了许许多多的朋友,包括不少领导干部。坐出租车有好几次人家都不要钱,仅仅要求我给他们签个名。还有一次打传呼,我用的是公用电话,报呼主姓名时被店掌柜听出来了,便问是不是《五男二女》那个焦景周?我说了声“是”不打紧,4毛钱传呼费掌柜死活不收了,还叫他们全家人都出来看我。洛阳传呼台的小姐记住了我的名字,当我自报家门时她们便会惊喜地和我攀谈起来,告诉她们的观感和心情,这种情况我不止一次地遇到过。我想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和神圣,这就是艺术的磁场和作用!一部电视剧使我和孟津县好几任领导成了好朋友,《五男二女》让我和数不清的父老乡亲心交意知,她甚至变成了我的一张名片,一张畅行于本土之上的特别通行证。一位县委书记曾经这样对我感叹说:“文章千古事,还是作家好呀!”姑且以为,孟津人尊重我,洛阳人知道我,包括这次洛阳大学把我请到李準先生的铜像前,主要还是得益于《五男二女》这部电视剧。

回头总结一下,电视剧的成功还是得益于小说,仰仗了小说。小说为电视剧提供了骨架,更提供了内核和灵魂。小说是爹娘,电视剧应该是儿女。

应该说,在军艺那个时期,我的小说创作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势头。只要写,发表不会成多大问题,那时我手里根本没有积压和发不出去的稿子。我有这样的自信,如果再创作一批东西出来,特别是只要有一篇走了运,我就能再跃上一个台阶,冲上一座山头,从而进入到比当时更高的层面里。电视剧创作也是这样的,《五男二女》之后,我完全应该再写出一部20集,或者再出来两个大部头,才不是冷枪冷炮,而形成集束或连射,在这门艺术的领地里爆发出更大的威力来。可遗憾的是,我没有组织再冲锋,放弃了进攻的努力,那些山头高地不是我没有攻下来,也并非实力达不到,而是我主动退了兵。

一晃就是8年。跨了两个世纪,晃到了知天命的年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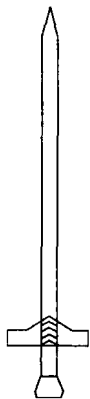
不能说不知足,也不能说很知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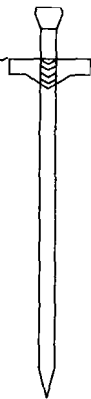
也不知人心怎样才算足?

当了干部还想当文人,当作家,当了兼职作家还想当专业作家。可是真正让你当了专业作家后,又会想起做官的好。真是“骑着驴骡思骏马,官居宰相望王侯”。其实你真的成王变侯时,说不定你又向往起清闲自在的山野居士,对酒吟诗的云游仙客,田园牧歌的世外子民的生活来。

想想,人就是这样说不透。

军艺毕业那段时间,同学们都在忙着找工作。我们那时找工作,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准确说是找与文学创作相对口的那份工作,再具体一点说就是找创作室,去当专业作家。因为军艺是军校,能到这里来学习深造的都是在职军官,最低也是少尉正排职,高的还有上校正团职,比有的老师和学院干部职务还要高。按规定毕业后他们都得返回原单位,返到他们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可军艺这个学校就很奇怪,毕业后哪个人也不愿再回原单位,团长、营长、连长,啥长都可以不要,上校、中校、少校,都可以视作无效,只要能找上个专门写小说的地方,有工资发,有军装穿,就等于进了天堂。不光文学系学员是这样,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各系的毕业生都这样。于是同学们便跑啊跑啊找呀找呀,其中的磨难辛酸自不必说,可还是难以上到天上。还由于大家都想留在北京,而北京有专业创作室的部队就那么几家,都设在总部、大军区和军种以上的大单位,且各个创作室的编制基本上都满员了,你的创作成就比人家高你的小说比人家写得好也不行,因为人家还没有退休或转业,那位置就不可能给你腾出来。尽管同学们勇气可嘉,甚至有点不惜一切,但成功者只是极少数,多数人都很沮丧,坐在小屋里空叹命运不济。我没有更多地向外联系,只是把目标锁定在了所在部队的本系统,即总参谋部政治部文化部这个聚焦点上。也因为当初进军艺时文化部李部长向我承诺过:“咱们总参一旦成立创作室,编





制就给你留一个。”然而总参这个创作室喊叫了很多年也没能成立，据说文化部报批了多次都没有批下来。不过我心里虽没着落但也怀抱希望，反正不着急，急什么？莫言还在那里站着呢！莫言是比我们大得多的作家，他还不是专业作家哩。总参没有创作室，他只能在文化部当干事，该守电话他不是得守电话，该写材料他不是还得写材料？比比莫言，我们一点也不亏。再说，组织上不是在一直争取这个组织吗？谁也不能说没有希望，我们总参系统像我这样的小说家还有好几个，大家都和莫言一样在盼着创作室的成立。可是最终我们也没有把总参的创作室盼下来。

军艺毕业后，我在北京又坚持待了一年多。文化部主管文艺创作的杨干事找到我，说老焦你先别忙回郑州，我们以部里的名义给你们学院去个函，文化部需要你留北京帮助工作。杨干事让我滞留北京，主要还是想等创作室的编制能够批下来，这样我就可以从军艺直接进到总参，不用再回郑州我的原单位了。结果还是等空了。据说总参首长有话：总参是指挥全军作战训练的首脑机关，不宜设专门文艺创作机构，如有这方面的人才，还是搞业余为好。

郑州的老单位对我很好，回来后依然器重我，职务给我提拔了，由副团晋升为正团，军衔也由中校晋到了上校。我开始坚持业余创作，其实业余创作也没有什么不好。我的老同学小老弟石钟山曾经给我传经说，专业有啥了不起，搞业余也能写出好东西。石钟山如今成了写小说和写电视剧的高手，他在北京很火。特别是这伙计转业多年后又第二次穿上了军装，进了武警部队的专业创作室，终归还是因了他的小说创作成就。阎连科就更不用说了，连科在军艺时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军艺毕业后他也没有直接进到创作室，而是从开封的部队调到了河南省军区，在宣传处当干事，也是在下面搞业余，后来才调进北京二炮去的。

我又在部队干了4年。前3年还是写了几个东西的，那时读军艺的热劲儿还没有下去，不写东西就手痒，但写作时间全靠星期天和晚上了。这3年我大概写了三四篇小说和两个电视剧，小说分别发在了

《青年文学》、《天津文学》和《莽原》杂志上,电视剧第一个是给别人改的,叫《河南妞》,没有啥名气,播播就完了。第二个便是《五男二女》,算是长东西,有25万字。老部队很支持我,时任解放军电子技术学院政委的谭昌明大校(后提拔为总参某部少将主任、政委)和电子技术学院政治部副主任的侯汉瑜同志(后提拔为电子技术学院政治部主任、信息工程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大校),二位领导亲自安排,给了我一定时间才突击完成的。在后来的拍摄过程中,电子技术学院也给予了力所能及的人力物力支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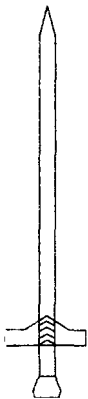
接着我便转业了。那已经到了1996年,《五男二女》刚开始热播。我转业不是人家部队不让我干了,不是组织上安排我走的,而是我自己的坚决要求。其实我要求转业的理由十分简单,就是在部队没有时间搞创作,领学员带兵和我的专业不对口。而且我的转向非常明确——郑州市文联。之前,郑州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曾亲自来过部队,当面动员过学院首长希望他们把我放走。谭政委很是惋惜地对我说:“老焦啊!脱下军装事关重大,一旦转业就没有回头之路了,你可要想好呀!”我说想好了,义无反顾,一点都不会后悔。就这样我离开了军营,脱下了军装,告别了长达28年的军旅生涯。忽然之间,那心情不知道是个啥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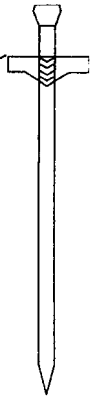
可是我却并没有到郑州市文联去报到,而是走进了河南省文化厅。个中因由不去赘述。文化厅一开始任命我为河南省艺术研究所副所长,从此又开始了我个人新的旅程。

事业的发展连我自己也没有预料到。官场仕途就不去说了,因为我转业就不是冲着当地方官去的,如果政治上求发展何如我留在部队上?起碼干到副师职退休没问题。我图的是写东西,出作品,我专业学的是写小说,只要我认真去写了,发表小说不应该是难事。然而随着我身上军装的脱去,把小说也给脱掉了,脱得彻彻底底、无影无踪。

电视剧也没有。

真正能够代表自己文学水准的作品,一个也没有。





想想,真是有点捣蛋!

当然,也不是啥都没写,还有两台戏呢。都公开演出了,剧本获过省大赛金奖,还获了“中国田汉戏剧奖”一等奖。仅此,评正高级职称的条件就够了。日后,我的一级编剧还真的沾了写戏的光。另外,别人把我的小说改成戏剧也获奖了。一篇《五男二女》,不光脱生了一部长篇电视剧,后来还被省青年剧作家陈涌泉先生改编成两台大戏,先后两届在省里获得大奖。这与小说提供的文学精髓不无关系。可这毕竟都是戏剧界文化部门给予的奖励,含金量也不能说不高,但她无论如何也替代不了小说。而且,不管获啥奖还不都是老小说,没有你的新东西。

我一下子掉进了戏窝里。

每个省都有一个艺术研究所。所谓艺术研究,实际主要是研究戏剧,当然也包括研究音乐、歌舞、曲艺、美术、摄影等众多的艺术门类,主要是舞台艺术。河南是以豫剧著称的戏剧大省,因此,河南省艺术研究所在河南戏剧界举足轻重,省艺研所所长在全省戏剧圈里自然也是一个令人刮目的人物。

其实我对戏剧研究得并不多,只是喜欢听戏。喜欢听豫剧的音乐和旋律,觉得这是一种精神享受,也是进行创作的一种外在动力。并不喜欢看她的剧情、故事和人物塑造,因为戏剧的文学性和小说的文学性没法相比,很老套也很落后,包括新创作的现代戏。这不仅是剧作家队伍的整体水平问题,更与戏剧的生产体制、生产环境有直接关系。尽管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戏剧行家,可我的位置比较重要。每次大赛,我是当然的专家、评委,当然的评委会副主任,可谓河南戏剧王朝里的一员重臣。因为我是军旅作家出身,又是主抓戏剧创作和研究的,写戏的人还比较尊重我。戏剧界有很多有趣的怪现象,有很多滑稽荒唐和稀奇古怪事和文学界大不一样。总之,我的感觉是这支队伍又庞又杂,啥人都有。但是,在这个圈儿里工作很有意思。就是能叫你活得很快乐,很热烈,一点都不寂寞,让你感不到孤独,这是搞文学创作特别是写小说的人得不到的享受。写小说纯属个体劳动,是以一个人的形式出现的。

虽然这种过程也有快感也有热烈情绪出现,但总体感觉是很苦的。即便小说发表出版了,那种收获的喜悦也仍然表现在个人形式上,形不成群体的情感交流,达不到人与人的情感共鸣。而戏剧创作则是一种集体劳动,戏剧艺术也应该说是一门群体艺术。这是指她的生产流程和操作环节而言的,就单个环节来说她也是个体行为,但一个环节绝对成不了一台大戏,终极产品应该是集体劳动之和。演员是终极产品的体现者,但她(他)不能离开剧本、导演、音乐、舞美、灯光、音响而独立存在。这样,搞剧本创作的人就只能是一种环节行为,就只能是集体中的一员。一集体起来就会很热闹,就会有说有笑,有唱有跳,就会很多人在一起做事情,就像生产队时在一块地里集体种庄稼。还会有很多的饭局、酒场、麻将扑克场。还会出席很多的会议,参加很多的庆典和仪式。还会不断地在剧场里抱拳相见,握手道喜。特别是某个剧团排出了一台好戏,大家便你赞我颂,就像放出了一颗上天的卫星那样相恭相贺,弹冠相庆。除此之外,你还会感受到很多场合的热烈气氛,使你的身价变高,让你身心受用,让你乐此不疲。工作在粉黛世界,置身于笙歌声中,你就会觉得你活得幸福而快活。而在经济方面,大部分人又都很穷,没有几个钱,但精神不穷,堪称殷实和富裕。

我没有写小说,不知道是不是和钻了戏窝有关系?

我的确很忙。忙着抓剧本,忙着抓研究,忙着搞大赛,忙着去评奖。这都是全省性的工作。除此之外,还得忙所里的几十号人,男女老少,吃喝穿戴,柴米油盐……

不知不觉间,小说就这样渐渐地离我远去了。

文学变成了我的一种回忆,一种思念。

好几年后我又调到了《传奇故事》杂志社。这是一份通俗文学期刊,在全国曾有一定的影响。这使我回到文学的大圈子里,为我重操小说旧业提供了气候和环境。特别重要的是,办这份故事杂志的人里面居然隐藏着一群很优秀的严肃文学作家。老主编老蔡先生虽然在文坛名气不大,但也写过两本书,属于历史小说。几位编辑颇有造诣,有孙





方友、汪溟、赵红都，都是小说家，赵小勇还是一位美术家。孙方友与我同辈，但小说起步很早，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了名气，尤以笔记体小说见长。很多年前，我和他一起参加过省作协代表大会，也是同批加入中国作协的，2000年我调到杂志社来时，他已经有了好几百万字的作品。汪溟和赵红都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势头很猛，出手不凡。河南省作协的田中禾主席把传奇故事杂志社称为“小文学院”。我相信，在这样一个生产文学的环境里，在身边的这些作家们不断耕种不断丰收的诱惑下，我那片荒芜了的庄稼地迟早会被我再去开垦的。

似乎还需要加把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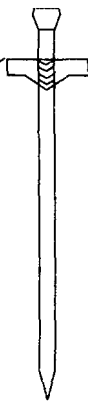
似乎还需要刺一下。

洛阳大学赵金昭校长这次就狠狠地刺了我一家伙，李準先生的这次纪念活动就点起了一把大火。于是，我想起小说来了，我该回郑州种“庄稼”了。

于是，我从洛阳回来后又开始了小说创作。仍然从中短篇写起，仍然钟情于农村和军事题材。其实，写起来也并不觉得陌生，“情人”依旧昔日模样。至于成色如何，会达到哪一种境界？我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回来了，又重新回到我的黄河边，回到了我的扣马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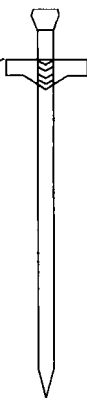
（原载《牡丹·河洛群星》，本书略有删节）

2008年9月



目 录

武将	1
红姐	53
奔袭	105
陈年旧事	122
位置	136
名额	149
还乡	161
第三座丰碑	173
苍日	187
编后	227



武 将

老人端坐在病房里的沙发上，坐态就像一尊钢质的雕像。这时候是南国的一个夏日，日光火毒火毒，射穿了玻璃射在了他的脸上。他脸上原本就有怒容，光芒一射，如草见火，七窍生烟，就好比一块凸凹不平的阵地在燃烧。这时候他就心躁手痒，枪瘾大发，神往那杀人屠生的旧业了。

老人说，他就是杀人出身的，他一辈子就是干杀人买卖的，专司的就是红白营生。六十年前的那个正月初七，他提着一颗老日的头参加了八路军。后来打老蒋，抗老美，广西剿匪，西藏平叛，还有 20 世纪后半世纪的两大自卫反击战，他已经说不清一共杀过多少人，取过多少颗项上人头了。老人说这才是军人真正的天职。他当排长、连长时对大家这样说，当营长、团长时也对大家这样说，直到他当了师长、副军长甚至边防军区的司令员时，还是这样讲给大家听。老人为创造此言而引以为豪，他的千军万马都为他能创造如此真言而引以为荣。只是这个区区女军医没有听说过，因为她没有生活在作战部队里，没听过枪声炮声厮杀声，更不知老人的军威和英名。否则，她无论如何也不敢蔑视老人，无论如何也不敢在这间病房里发起那场战争，直到老人逃命一样地逃离这家医院。

老人在杀心萌动的时候也还是有点哀怨，怨当初不该把自己交给了这个女军医，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后悔。1987 年授衔时，按照他的条

件是可以授予中将的,却仅因参加革命晚7天而被授予了少将军衔。那时候他倒是没有半点怨言,军委和大区首长都知道他这个情况,都觉得有点亏了。军区干部部的刘部长甚至还动员他回山东老家的县里开个证明来,证明他在参军前就在地方上参加了抗日,民兵也算数,这样他肩上一颗金星就变成两颗了。可他坚决不答应这样做。一晃15年过去了,这次越住院才越觉得有点亏了。要不然咋会住这种“标间”?“标间”就是现在宾馆里说的标准房间,病房和宾馆里的房间一个样,两张床,两只沙发,附带一个卫生间,别的啥也没有。可中将的待遇就不一样了,中将医院就得给大套间,房间里有会客室、电话、电视和地毯。特别是护理也不一样,应该是专护或特护。老人没有专护,更没有特护,是年迈的老伴一个人陪床护理的,病区所配医生也不一样。老人其实并不想要职称多高、医术多好的医生,他想要的只是一个好人,或者说一个好兵,然而他却没有遂了心愿,偏偏让他遇上女军医这个丧门星。

老人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个女军医。堂堂一个陆军总医院,啥时候混进了这样一个兵?要是在他执掌的医院里,他早就把她掐死了,可这是大区总医院,不是他边防军区的小医院,更不是他的师医院。何况10年以前他就离职休息了,离职休息了就啥也不是了,离职休息了就等于回到他60年前的样子了。从前他从奴隶变成了将军,如今他又从将军变成了奴隶,眼下他可不就是女军医颐指气使下的奴隶吗?

老人想起了老日的那颗人头。

老人想起了很多很多的人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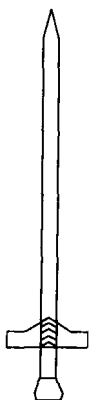
可是已经没有用场了,他连那把枪也拿不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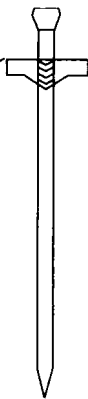
他只是心杀而已。他患了绝症。肝癌晚期。

二

他姓杨。

没有人称呼过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一直随着他职务的变化而变化。





当连长时他叫杨连长，当团长时他叫杨团长，当师长时他叫杨师长，他最后的名字就是杨司令。杨司令这个名字永远地把他定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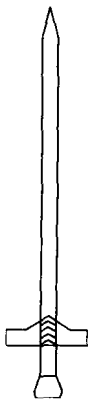
杨司令病情的发现源于那次喝酒。杨司令很能喝酒。这次他是和王副政委一起喝的酒，那酒的名字叫五粮液。他俩的规矩是一瓶，可是这一瓶酒还没有喝完杨司令就倒下了，很有点反常和出乎意外。杨司令和王副政委是老战友，也是老搭档，在枪林弹雨中搁了几十年伙计。杨司令当步兵连长时王副政委就是步兵连的指导员，他俩一直都在并肩前进，直到一个当了副军长一个当了副政委。后来杨司令到边关当了司令，王副政委再没晋升，在副军职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两人的关系密不可分，部队官兵们念转了姓音，给他俩统称“阎王”。在他们那个部队里，可以说一提“阎王”，神鬼俱惊，连家属院的小娃娃都害怕。杨司令和王副政委不仅是好战友，而且是好酒友，好友好酒了大半辈子。论水平杨司令要技高一筹，王副政委甘居下风。休息以后，酒就喝得少多了。两家不在一个地方住，约定一星期见一面，一次面一瓶酒，一轮一个家。不管在谁家，都是五粮液。这规矩一直兴了十几年。今天该杨司令设桌，杨司令亮的酒牌自然还是五粮液。王副政委先是辨了真伪，他根本不用真伪镜，而是把酒瓶举了个底朝上，轻摇几下，观察了滚水般的酒泡泡后，就给杨司令点了一下头。接着二人就一对一地干了起来，省略了很多过场。酒过半瓶后，他们的话才开始稠了起来。先是议酒价，抱怨现在的五粮液真他娘的贵，买一瓶得三百多。王副政委说咱们那时候才两块五毛六，杨司令纠正说不是两块五毛六，是两块五毛三。接下来的话题有两个，一是打仗，二是喝酒。基本上都是回忆性质的。这时候他们的激情才会燃烧，这时候他们才会论天下谁是英雄，其实这样的话已经重复了几十年，然而每次重复他们都感到那样新鲜，一点点都不觉得厌烦。每每这个时辰，这般光景，他们都会重复一个故事，那自然还是打仗和喝酒的故事，这个故事每次都让王副政委先讲，杨司令再作必要的更正或补充。王副政委这个故事讲的就是杨司令。内容大致如下：1962年的那场边境反击战胜利以后，部队庆功祝捷，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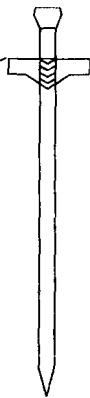
假三天。那时候杨司令叫杨团长，王副政委叫王政委，他们是主攻团的团长和政委，全团立了大功，那几天正沉浸在一片欢庆中。是日，忽有一个壮如牦牛的小藏民“打进山门”，说是专找杨团长来喝酒的。他说他是这里的酒王，谁也喝不过他，听说杨团长也能喝酒，就慕名造访来了。当时经简单了解，得知小藏民还是这一带藏区的小首领。由于少数民族分裂分子的挑拨，藏民们时有和解放军发生摩擦的现象。这正是做群众工作的一个好机会，杨团长当即就慷慨应战，说他来的正好，我的嗓子眼正发痒痒呢。政治处李主任请示说咱要赢他了是不是给他讲个条件？杨团长立马急了眼，说什么条件不条件，喝酒就是喝酒！完了他就和小藏民开始喝酒了。那简直就是一场豪赌，就是一场拼胆拼量拼勇拼命的大恶仗。酒场就摆在团部大院里，汽车拉来了五坛子烈性青稞酒，王政委当主持兼裁判，团部三大机关和警卫排的人差不多都来观战了。他们是一碗一碗地对喝，四坛酒很快就空了。第五坛刺刀见红，简直就像喝毒药，四只眼都像从血里捞出来的。小藏民终于没能坚持下去，第五坛没喝完他就轰轰烈烈山崩地裂般倒下了。是杨团长的苏联吉普车把小藏民送回家的，车上又陪送他了五坛青稞酒。其实杨团长当时也不行了，再喝一口他可能也会倒下去。他硬是撑住了，挺住了，把对方挺倒了。警卫排的人欢呼着要把团长抬回去，他不叫他们抬，也不叫他们扶，硬撑着一个人走回宿舍里，倒下去整整两天两夜没有起来。后来杨团长和小藏民还有一段生死之交，这是酒外之话姑且不表。“那时候你 37 岁，他可能不到 30 岁。”王副政委拍拍指头说。“不到，他才 28！”杨司令很激动：“不过，我比他多上了一次厕所，多撒了一泡尿，那泡尿足有 3 斤哩！”说罢杨司令便哈哈大笑地大笑起来，王副政委笑得更厉害。他们笑得那么开心，那样纯粹，没掺半点假，以至于把小院树上的鸟儿都给惊飞了。

杨司令这一笑就笑出了问题。

只见他大汗淋漓，抽搐不止，连哎呀一声都没有便扑腾倒地了。

他是被干休所的军用救护车送到陆军总医院的。他休息在内地的





一个省城，陆军总医院就在这座省城里，救护车呼叫着穿越市区，40分钟就赶到了医院。

应该说，在这个大军区，甚至在这座大城市，陆军总医院是一家颇负盛名的医院了。辖区部队一般的官兵，一般的病号都不允许入住此院，只允许入住当地驻军医院或野战医院，医治不了的疑难和危重病号通过一定手续才可以转进来。杨司令不受这个限制，他可以直接住高干病房。救护车把他拉来的时候直接进入的是急救室，需要进行紧急抢救。随车而来的还有他们干休所的所长、干休所卫生所的所长和杨司令的老伴。当时两个儿子都没有在家，三个儿媳都争着要来。老伴没有同意。两个所长也不主张全家人都去，说首长可能是过于激动，一时休克，估计不会有大问题，因为平时首长的身体很好。于是急救室立马对杨司令进行了急救，很快就把杨司令给急救过来了。急救医生的急救结果也十分明确：病人的心血管没有问题，脑血管也没有问题，病人的临床症状是肝昏迷，需住院进一步观察、确诊和治疗。

杨司令这就住进了高干北楼的201，从此也就认识了主管201病房的女军医。干休所所长本意不想让杨司令住北楼。早在从急救室往病区转移之前，这个大校所长就去找过总医院领导，说杨司令不是一般首长，并特别强调了杨司令是边防军区司令，最好能给照顾一下安在南楼，结果被院方婉言拒绝了。说真是没有办法，医院有严格规定。南楼是中将和副兵团以上的，而杨司令只是少将和正军，不管边防司令还是内地司令，享受的医疗待遇都一样。回答大校所长的是总医院的一个副院长。住进北楼后，大校所长见病房条件实在太一般，不仅房间狭小，设施简陋，墙上的白灰都脱落了。特别是没有配备电话，杨司令又不用手机，里外联系很不方便。他只好恳求杨司令，是不是叫他们正院长王保江亲自来一趟，见见他的老首长，你当师长时，他王保江不是你团里的一个卫生队长吗？医院里就是再有规定他也应该照顾你呀！这时候杨司令已经从昏迷恢复了正常，没想到他根本不同意住南楼，反而给干休所所长做工作，说部队没有钱，这里离市区也远，总医院的经济